

全球智库半月谈

长期经济增长被低估：来自叠接国民经济核算的偏离

五年后再看 G20 金融改革议程

外包和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

谈判一周年：TTIP 仍在向前迈进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制造业的未来

摧毁“伊斯兰国”：奥巴马的战略会成功吗？

本期编译

郭子睿

黄杨荔

李 想

刘 宁

刘天培

刘兴坤

马文龙

沈仲凯

苏 丹

许平祥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长期经济增长被低估：来自叠接国民经济核算的偏离 3

导读：正如 2013 年尼日利亚的 GDP 被明显高估一样，在 GDP 统计过程中，一国对基准年份的选择尤为重要。本文解释了基准年份变化是如何导致新旧国民核算序列之间的一致，以及为解决此不一致性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是如何导致历史 GDP 和增长率估计值出现偏差的。通过比较西班牙和法国历史 GDP，与传统“外延”法相比，内插法的结果更合理。

《21 世纪资本论》中的公平问题 7

导读：本文对《21 世纪资本论》中的公平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并为政府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一些措施。

印度经济巨人终将觉醒 10

导读：随着纳伦德拉·莫迪大选的胜利，印度经济前景一下明朗起来。本文分析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指出未来的印度甚至有可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超过中国过去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

全球治理

五年后再看 G20 金融改革议程 12

导读：在五年前的伦敦和匹兹堡峰会上，G20 发布的宣言对金融监管改革列出了一些具体的承诺。如今对照起来，许多承诺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然而，从稳定全球金融的目标来看，这些改革的效果并不明确，这是由于缺乏对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分析的共识。此外，改革也逐渐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改革的初衷还尚未完成。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G20 既没有建设好充分的制度基础，也没有就全球融合的金融体系创立出一致的政策视角。

危机潜伏之处 16

导读：一个小幅冲击也可能产生较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导致长期和持久的衰退，这被称为“黑暗角落”。但是之前，主流经济学界并未对此予以足够重视。此番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我们离“黑暗角落”比想象的要近得多。

外包和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 19

导读：现代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变有多少是基于组织边界的转移，即过去在制造企业完成的工作现在有多少外包给专业服务企业？本文考察美国经济过去 60 年的结构变化，发现其投入产出结构的转变主要源自专业技术和商业服务的外包，这解释了服务业增长的 36% 以及制造业下降的 25%。

经济政策

谈判一周年：TTIP 仍在向前迈进 24

导读：从 2013 年 7 月开始，TTIP 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在第七轮协商即将开始时，有必要全面地评估过去一年来 TTIP 的成果，并提出有效的建议。

欧洲通过基建投融资以促增长 26

导读：为实现欧洲潜在的长期增长并增加就业岗位，本报告认为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更多、更好的投资。以下是相关政策建议的总结。

聚焦中国

中国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支付系统角度 29

导读：文章认为全球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支付系统。中国要想参与全球货币体系，需要推动国内经济、政治改革，同时也要积极地与全球货币体系建立对话。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制造业的未来 31

导读：大衰退之后美国的制造业有所反弹，但就业水平并未从衰退前十年的陡降中恢复过来。本文讨论了中国崛起对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影响程度，既估算了从中国进口带来的直接竞争作用，也估计了本土劳动力市场和买方-卖方的间接影响。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不大可能好转。

战略观察

ISIS 如何为其恐怖统治筹集资金 35

导读：一个自称是建立了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在短短的时间内到处攻城略地，那么这个组织是如何筹集其活动资金的，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些组织是受到了外围国家的援助，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所谓的外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资金来源于 ISIS 本身。打击 ISIS 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摧毁“伊斯兰国”：奥巴马的战略会成功吗？ 37

导读：2014 年 9 月 10 日美国奥巴马总统推出了打击 IS（“伊斯兰国”）的策略。但这六点计划更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预言。也许只会带来持续不断的灾难，这一战略是否可以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本期智库介绍 40

长期经济增长被低估：来自叠接国民经济核算的偏离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正如2013年尼日利亚的GDP被明显高估一样，在GDP统计过程中，一国对基准年份的选择尤为重要。本文解释了基准年份变化是如何导致新旧国民经济核算序列之间不一致，以及为解决此不一致性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是如何导致历史GDP和增长率估计值出现偏差的。通过比较西班牙和法国历史GDP，与传统“外延”法相比，内插法的结果更合理。编译如下：

今年4月份，尼日利亚将核算基准年份从1990年修订至2010年，从而导致其对外公布的2013年度GDP被高估了89%，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虽然尼日利亚2013年度GDP偏离较离谱，但这并非特殊事件。加纳（2010年）、阿根廷（1993年）和意大利（1987年）也曾明显高估过本国GDP。基准年份的调整将如何影响GDP时间序列，并继而影响一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呢？既有的历史时间序列也应该按照相同比重进行相应调整吗？

官方国民经济核算只能在短期内通过齐次方法进行调整，通常仅限于20世纪中期之前的数据，且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频繁使用。因此，当计算齐次长期GDP时间序列时，不同集合的国民收入会采用不同的基准年份，并且通常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叠接。为得到单一的GDP时间序列而采用不同的叠接方法，可能会使得GDP及其增长率出现显著差异，继而导致一国在一段时期内经济状态的估计值大幅度偏离实际。

1、GDP统计的基准年份

为核算同一基准年份的GDP，国民经济核算依赖于数量和价格方面的“完全”信息，继而需要在关于产品和服务样本有限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外推。为考虑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避免现期标准的远期预测变得不具有代表性，国民经济核算周期性采用新的和较近的GDP基准期作为现期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不同来源和计算方法构建了新基准。通常情况下，“新”国民经济核算和“旧”国民经济核算在新基准年份存在的差异源于统计（来源和估计程序）和概念（定义和分类）方面。一旦引入新基准，新得到的统计特征不会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以避免既存GDP序列的不连续性。因此，新经济行为的覆盖范围能够部分地解释“新”时间序列和“旧”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的差异。随之也就产生了“新”国民经济核算和“旧”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一致性问题。

解决此不一致性的方法是，基于新基准所使用的同样数据来源和方法，重新计算旧基准所涵盖年份的GDP。然而，这一解决策略超出了独立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源限制。因此，现在的挑战是确定新基准序列的概念和技术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暗含了旧基准序列所存在的测算误差。尤其是，新基准（通过“完全”信

息估计GDP)和旧基准(运用数量和价格方面的简化信息从初始年份预测“完全”信息估计)在重叠年份方面的差异,是否源于旧基准的初始年份估计所存在的测量误差。

2、“外推”法

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要解决这一误差,被广泛采用的方法是“反向投影”或“外推”法,其接受近期基准估计所提供的参考水平,并且可通过两个GDP序列重叠年份的新序列和旧序列之间的比重来重新调节前期基准序列。

此种方法暗含的假设是,旧基准序列的相对误差是常数,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假设旧序列的变化率不存在误差。官方国民经济核算倾向于使用这种连接国民经济核算序列的方法,因为其保留了前期基准的变化率。

通常情况下,最近的基准能够为重叠年份提供较高的GDP,因为其经济行为的涉及范围更广一些。因此,考虑增长率的新基准GDP的“反向投影”意味着,对前些年GDP进行了系统性的高估。对于重叠年份,当新旧基准之间的差异很小时,这种对叠接GDP序列单方面的高估效应几乎不被注意,并且被设定的时间跨度很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前期序列为了与新序列相匹配而反复调整,这种高估将明显加剧。

3、内插法

与反向投影关联相对应的是内插法,对于每个基准年份直接计算GDP是可能的最优估计值,因为其基于数量和价格的“完全”信息,并且分散了重叠年份期间新旧基准序列之间的差异。

与“外推”法不同,内插法假设误差产生于年份0和年份T之间。因此,其修正了基准之间的年度变化率,同时保留了未被修改的初始水平(旧基准的水平)。结果,初始水平可能会低于通过“外推”法得到的结果。

4、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

序列连接方法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GDP的绝对水平和增长率。当通过外推法重新调整早期年份的GDP,从而使其被高估时,样本国家就会变得回顾性富裕。相反地,内插每个原始基准易于提高特定经济体的增长率,并进而意味着较低的初始GDP水平。那么,哪种方法较为合适呢?通过分析西班牙的情况(在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深刻的结构变革),也许能够得到切合实际的答案。

图1描绘了通过非线性内插的叠接国民经济核算所得到的GDP水平与通过外推法得到的GDP水平之间的比较。我们可注意到,采用外推法时,GDP被高估的部分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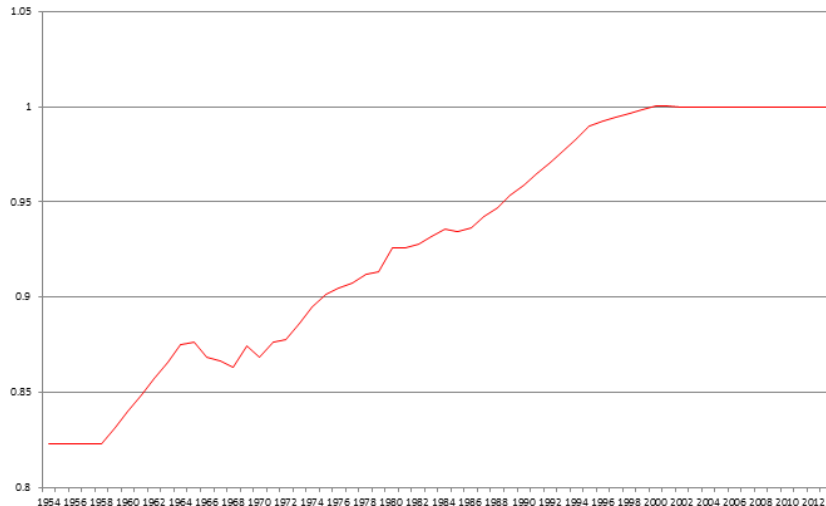


图1 叠接的内插序列占外推序列的比重，1954-2013年（以当期价格核算的GDP）

从长期来看，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当叠接国民经济核算反向投射到19世纪，则得到由历史国民经济核算序列中提取的容积指数。这是因为1950年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因此一国截至20世纪中期的人均GDP决定了其先前在国家排序中的相对地位。

因此，在长期内，叠接方法的选择能够对一国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对排名产生很大影响。为了解释这一点，本文讨论了通过外推叠接法和内插叠接法所推导的西班牙相对于法国的经济地位（图2）。

根据外推叠接法，截至19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均GDP基本上与法国相当。相反地，根据内插叠接法，西班牙人均GDP为法国的80%。1850-1913年期间，根据外推法，西班牙实际人均国民收入与法国相当，而根据内插法，则仅为法国的4/5。如果将样本期间延长到1935年，西班牙相对于法国的情况基本不变。总之，不管内插法所存在的测量误差如何，其结果似乎比传统外推法所得到的结果更加合乎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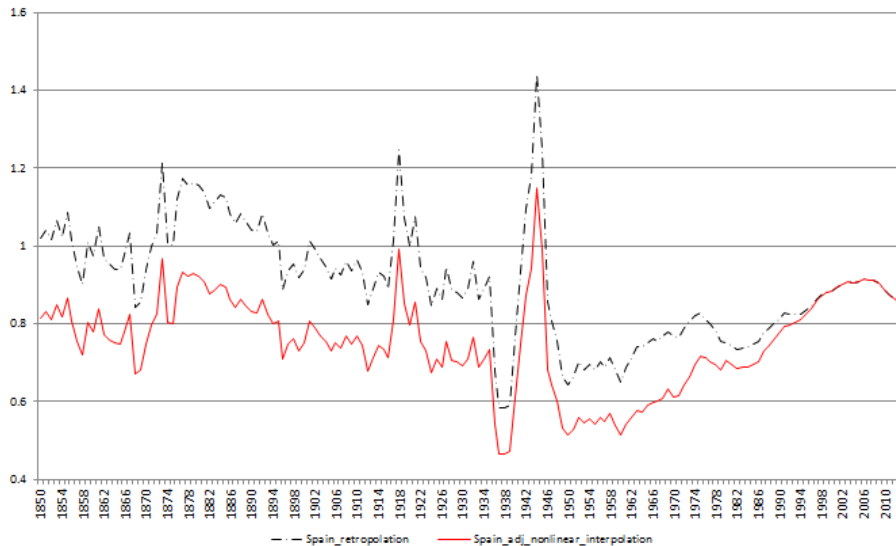


图2. 西班牙实际人均GDP（法国=1），选择性叠接(2011 EKS \$)

5、结论

一国对叠接国民经济核算的处理必须高度谨慎，尤其是当一国经历了急剧经济增长和深度结构转型时，因为此时容易导致国民收入绝对水平偏高，继而使得经济增长率偏低。过去半个世纪，高速增长经济体通过内插法对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了系统性修正，这极有可能降低其初始人均 GDP 水平，同时提高其经济增长率，从而形成对核心国家更快速和更广泛的赶超。

本文原题为“Mismeasuring long-run growth: The bias from spliced national accounts”。本文作者为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经济师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9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1 世纪资本论》中的公平问题

Tomas Hellebrandt/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本文对《21 世纪资本论》中的公平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并为政府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一些措施。编译如下：

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21 世纪资本论》在社会舆论和学术圈中都引发了强烈反响。该书的中心理论是：资本主义具有引发财富所有权不平等的天性，这会在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至低于资本回报率时显现。该理论挑战了许多广为接纳的观点，如宏观经济学对代表性主体（representative agent）模型的依赖、市场竞争机制的稳定性，以及对总生产中资本与劳动间替代程度的传统观点。

然而，公众对该书的巨大兴趣也表明，在少数精英与大众间鲜明的财富对比下，不公平性日益增长。这一情况在美国尤其显著——正如皮克提所言，社会顶层与其余阶层的财富差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他认为，公众对公平问题的关心至少得到了部分证实：以英语国家中居于收入分布顶端的高管为例，他们的收入相对其余群体急剧增长，后者包括与前者学历相似的人群；相较欧洲大陆与日本，他们的收入也在急剧增长。然而，在总生产率数据中，他们的工作绩效并未表现出相应的提高。

可能有人对皮克提的解释吹毛求疵，后者对降低最高收入税率予以批评，因为它增加了大企业高管参与寻租活动的激励。但国别间的巨大差异表明，英美式资本主义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路径中存在某些独特而令人讨厌的因素。我们无法探讨、评估顶层收入或财富的决定性因素和他们的社会价值，而在收入分布峰值未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寻得纠正不公平性的方案。因此，皮克提及其同事搜集的数据为社会科学民主辩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皮克提的数据为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考察视角，但当我们发现大萧条未使富豪受到损伤，并为其在“经济蛋糕”中所占份额的持续增长而愤怒时，我们不该忘记，还需注意另一极端。的确，自由平等的传统尤其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状况。累进税的一个重要目的正在于，为旨在改善社会底层境况的社会事业融资，而非防止富人与中产阶级差距过大。

衡量一个类似“不平等性”那样有关道德的概念无疑是个挑战，没有什么统计方法能够充分捕捉到社会对资源分配的规范态度。显然，前 1%-10% 的收入或财富份额并未告诉我们关于社会最底层的信息，比如发达国家中顶层收入所占份额与贫困率间的关系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此外，顶层收入或财富的份

额并不适用于分析某些最重要的公平性问题，如历史所致的物质匮乏及由此而生的歧视。

说句公道话，皮克提很清楚试图以单一方法总结不公平性的陷阱。他写道：“不公平性对社会现实、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在不同分布层次上存在差异，因而对其加以单独分析很重要”（第 266 页）。有些人期待在皮克提的书中找到对不公平性的详尽解释，我的评论只是这一观点的重点之一。

若以自由平等的眼光看，20 世纪财富分配的改善——如皮克提论述的那般——似乎不如顶层财富份额的大幅下降引人注目，因为再分配仅发生于中值以上的群体。目前，后 50% 人群占有的财富依然如从前一样微少。毫不讳言，世袭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发达经济体具有深远的经济与社会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平性将会显著提升。

同样，皮克提针对顶层财富份额急剧扩张提出的补救措施——对全球的资本或净资产征税，主要是在现有的财富所有者间再分配财富。这减轻了（绝大部分中产阶级）贷款人的税负，目前，他们根据财产总值而非扣除抵押贷款后的净值缴纳财产税；同时，这增加了富人的税负，他们持有的投资组合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后者目前免于缴税。除非财产税以大幅提高国家收入为目的，否则，处于财富分布下半段的群体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

涉及公平的另一个重点与两种财富形成的方式有关，一者由终身储蓄形成，另一者通过继承遗产而得。普遍认为，好的资源分配方式应对人们的选择敏感，而对做出选择的环境或禀赋不敏感，因为后者多源于运气而非选择本身。尽管储蓄与投资造就的财富不均部分地受到可储蓄收入分布的影响，但在相当程度上，这反映出人们在储蓄与消费、风险投资与保守投资之间的选择。假如人们在事前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承担后果就是公平的。因此，储蓄导致的财富不均引发的道德问题要比继承财产小得多。

我认为，皮克提最令人震撼的分析在于阐释了继承性财富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法国为例，在最近出生的人群中，约 1/8 的个体将要继承的遗产至少与收入位列社会后 50% 的劳动者的终身劳动收入相等，该比例之高史无前例，而这是收入居于中值以上群体间财富再分配的直接结果。财富在相对富裕群体间的再分配将使对不公平性的纠正更加困难，因为支持低遗产税的选民份额在增长。

在分析不公平性与分配公平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顶层愈发集中的收入与财富这方面，《21 世纪资本论》达到了新境界。但若想在 21 世纪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则需更加关注社会底层。其中，一项关键的首要举措在于，通过支持贫困家庭的儿童受教育以降低人力资本上的不平等。关于儿童早

期发展重要性的证据越来越多，这应对公共投资有所指引——投向幼儿教育、对父母的支持与培训、营养援助等领域。此后，还需在为劳动力市场提供职业教育、学徒计划等过渡项目的好处，与根据能力较早挑选学生进入不同职业轨道的成本间进行平衡。在鼓励贫困家庭的儿童凭借助学金获取高等教育这一议题上，大多数国家可以做得更好。

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政府也还能做很多事。对低薪工人的收入支持，如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扣抵制，是降低工作贫困的一个有效方式。该制度与最低工资标准搭配使用效果更佳，后者能防止对低收入者的补贴被雇主攫取。失业率的地区间差异可通过增强地理流动性的政策消除，比如移民区的设置和对租房的支持。政府还可采取税收激励与扶持政策，以鼓励残疾人及其他弱势族群就业，比如欧洲的罗马人。

即便皮克提构想的“乌托邦税”成为现实，中产阶级仍将继续作为税基的主要群体。确保富人阶层做出相应的担当非常重要。21 世纪真正的政治挑战，将是维持对“全社会共担实现公平之责任”这一观念的支持。

本文原题为“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文作者为 PIIE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印度经济巨人终将觉醒

Desmond Lachman /文 苏丹/编译

导读：随着纳伦德拉·莫迪大选的胜利，印度经济前景一下明朗起来。本文分析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指出未来的印度甚至有可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超过中国过去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编译如下：

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华盛顿，奥巴马总统很可能对印度产生同样的看法。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沉睡后，终于开始醒来。随着主张大刀阔斧改革的莫迪执掌政权，未来的印度甚至有可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超过中国过去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

尽管在 1947 就已经取得独立，然而在此之后很长时间内，印度整体经济一直处于 3% 左右的低增长状态，这也被世人诟病为“印度式发展”。然而到 1992 年，时任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开启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印度经济也从此开始高速增长。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印度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 8~9% 的水平，这也使得它和中国一并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然而可惜的是，随着 08 年经济危机的开始，印度由于其内部存在的种种缺陷，一下失去了高速增长的动力。例如其中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官员腐败，事实上这也是自印度独立以来 70 年间一直存在的问题。幸运的是，随着纳伦德拉·莫迪获得 2014 年 5 月大选的胜利，印度经济前景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这不仅是因为莫迪一直被认为是有效经济改革者，也在于他在竞选中承诺要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经济体系。如果他真的能够成功，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投资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取得成功，那么印度经济的好日子就真的不远了。

当然，为了取得改革的成功，莫迪也需要面临非常多的挑战。目前来看，尽管他拥有印度议会下议院的控制权，但是在上议院他仍然面临着非常强硬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他也需要面临国内盛行的官僚主义之风，这些因素对经济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从美国角度来看，相比于中国，印度的确拥有一些可以支撑其经济长期发展的优势：年轻且高速增长的人口结构、经济起点较低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印度更有可能在未来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此外，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和美国拥有一定程度相同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印度和中国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一些人希望奥巴马总统可以提供莫迪经济改革上的援助。这不仅是因为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给美国商业带来一个新的国际投资渠道。

更重要的是，通过帮助印度摆脱贫困，美国可以在亚洲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本文原题为“Is the Indian economic giant finally awakening”。本文作者 Desmond Lachman 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刊于 AE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五年后再看 G20 金融改革议程

NICOLAS VÉRON/文 李想/编译

导读：在五年前的伦敦和匹兹堡峰会上，G20发布的宣言对金融监管改革列出了一些具体的承诺。如今对照起来，许多承诺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然而，从稳定全球金融的目标来看，这些改革的效果并不明确，这是由于缺乏对2007-2008年金融危机分析的共识。此外，改革也逐渐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改革的初衷还尚未完成。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G20既没有建设好充分的制度基础，也没有就全球融合的金融体系创立出一致的政策视角。编译如下：

G20 集团对金融监管领域的授权由 2008 年 11 月中旬召开的华盛顿峰会拉开序幕，并在接下来 2009 年 4 月的伦敦峰会和同年 9 月的匹兹堡峰会之后，金融改革议程经历了大肆宣传、失望和犬儒主义的周期。这一改革启动五年之后，今天再来看 G20 金融改革的成就和挑战，局面自然有好有坏。首先，尽管个别领导人偶尔有鼓舞人心的讲话，但就改革议程仍没有纵览全局的一致认识。其次，对 2007-08 年金融危机的起因和推力也没有形成贯穿各领域的共识。

尽管其中一些宣言没有切实的结果，但大多数承诺至少采取了某种政策措施。然而，从更广泛的层面讲，过去五年全球金融改革的努力并不成功，其既未能建立充分的制度基础，也没有就全球金融体系创立出一致的政策视角。这使人怀疑未来金融的稳定性和当前跨国金融深化水平可持续性。

1、G20 金融改革议程

2007-08 年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欧洲缺乏一个监管系统性风险的公共权威机构的后果。相比之下，亚洲和世界其他对于系统性金融危机记忆犹新的国家，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政策，因此受次贷引发的金融风暴冲击较小。因此，最初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应对包含着临时试验和边学边用的意味。G20 金融改革议程也反映了这一现实，它是一系列应对 2007-08 年金融系统失灵特定状况的单个政策的集合，而没有就危机的内在起因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2008-09 年首次提出 G20 改革议程时就没有形成共识，到今天也充满争议。

很快就可以发现，G20 需要一个永久性的制度基础来践行领导人豪言壮语的后续工作。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逐渐扮演了这一中心角色，它在伦敦峰会上改名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金融稳定委员会有效地起到了 G20 集团秘书处的作用，为其他全球性的金融主体协调与 G20 有关的政策进度。

至于 G20 议程的内容，如前所述，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政策话语体系。这些独立的政策行动主要可以被划分为三大类：管制、协调和观测。

- **管制**

一方面，G20 决定对危机前就有的主体和活动强化监管框架。比如《巴塞尔协议 III》对银行的资本、杠杆和流动性所提出的更为严格的要求，对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实施特别管制协议。另一方面，对 2008 年之前未被纳入监管范围的主体和行动进行全面的监管，比如场外交易衍生品、管理层薪资水平、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影子银行、LIBOR 和其他参考利率等金融基准。

- **协调**

首先，G20 力争推动全球会计标准的统一。其次，其试图解决包含跨国业务在内的复杂金融机构内的协调问题。最后，G20 还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中的特殊性给予关注。

- **观测**

所谓的观测，主要是指应对“数据差距”的问题。这一表述既表明要弥补既有的统计与金融监管机构的数据不足，也包含着创建一套全球性数据的雄心壮志，以帮助估算系统性风险。

2、成就与挑战

G20 金融改革议程的分散性与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其执行情况做一个概括。以下列举的几个方面是作者认为较为重要的。

- **银行资本与杠杆率**

2010 年的《巴塞尔协议 III》相比 2004 年的《巴塞尔协议 II》有很大进步：就监管的目的而言，对于银行资本的定义大为收紧；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此前表外的风险和资本现今需纳入表内；引进了杠杆率的概念，可用于对照银行自己计算的风险程度；对大多数系统性重要的银行股和金融周期高点时的所有银行都实行了宏观审慎的要求。大多银行业内人士认为《巴塞尔协议 III》太过严格，导致信贷紧缩，而许多学者则认为其太过宽松，有很多钻空子的机会，本文作者则认为该协议所要求的资本与杠杆率水平较为合理，可视为成功的政策。

- **银行流动性**

相比之下，《巴塞尔协议 III》对银行流动性的要求更具有实验性的意味，更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经济后果。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率的概念设置了相对长时间的试验期与过渡期，前者旨在防止短期流动性短缺，后者的目的则在于维持银行资本与负债流动性水平的平衡。这方面政策的实施效果仍有待检验。

- **数据差距**

改善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与跨境一致性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金融系统并进行跨国比较，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已经有过不少努力。国际

清算银行的数据有可能允许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把握银行间的风险暴露和集中程度，但相关信息的准入有严格限制，大部分只能提供给银行监管者。与之相关的一个领域是单个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金融稳定委员会认可了一些很好的实践，但对于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披露要求仍踌躇不前。

- **场外交易衍生品**

从实践来看，主要衍生品市场的改革非常艰难。一些要求没有完全执行，或者直到最近才开始执行。通过将衍生品交易系统性地报告给贸易数据库，从而达到识别风险转移与风险集中的目的，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推行的方法可能导致各个数据库之间的碎片化，妨碍监管者看到全貌。衍生品市场改革的大部分政策所需的代价都很高，并且不知道这些代价是否能换来金融稳定。

-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处置**

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就在国际化银行中的不同国家法律主体之间如何达成协议以及制定债务最低要求等方面完成了许多工作。但实际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金融稳定委员会提出的目标是“终止大而不倒”，现在看来这一目标或许过于远大。系统重要性银行处置的有效性要很长时期之后才能得到真正评估。

- **非银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影子银行**

金融稳定委员会尝试对系统重要性的保险商、资产管理商、金融基础设施和以“影子银行”为名的一系列市场参与者制定特定的监管框架，但它没有充分考虑到金融体系的多样性和不同非银行金融中介所面对的具体风险。讽刺的是，对保险业和某些类型的基金实行错误的监管框架将导致他们的行为更为顺周期，而且在他们的负债期限很长的情况下破坏他们平滑金融周期的能力。

- **会计准则的统一**

G20 议程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失败的。独立的会计标准制定者无视了 G20 旨在统一会计准则的政策。虽然这并不能说明未来无法实现会计标准的统一，但如果实现了，也很难说是 G20 的功劳。

- **机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的金融危机之后，包括 G20 和金融稳定论坛在内的许多新的机构和集团建立起来，但 2007-08 年的金融危机却没有催生新的大型全球性机构。尽管如此，机构发展状况仍然十分显著：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内的大多数全球金融机构，成员国数量都有增加，而且能更好地代表规模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国家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金融稳定评估计划的纪律。此外，巴塞尔委员会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方法来监管不同国家对协议的执行情况。即使没有一个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主体，这种方法似乎通过同伴之间的竞争压力而促进了政策落实。

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第一，这些机构没有基础广泛的认同，容易导致权威的缺失。第二，在没有强大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情况下，雄心满满的监管议程与各国监管主体碎片化的现实相结合，必将限制跨境金融整合的水平。

3、前景与选择

虽然有如上所述的诸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地认为 G20 金融改革议程将无功而返，许多领域仍可能有重要的进展。比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巴塞尔协议 III》实施情况的监督可帮助欧盟修正现有的法律条例，从而更好地与国际标准接轨；美国当局可以允许国内的上市公司采取国际金融财务报告准则，为该准则的进一步推广开路；或许可以找到更合理的做法来识别各个衍生品交易，等等。当然，每一步都将面临重大的政治障碍，但目前来看也绝非毫无希望。

为更好地代表全球情况，更多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全球金融监管主体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为更好地支持全球金融一体化，有必要创立一个一致的金融信息基础，而超国家的监管主体应该担当此任。

G20 金融改革议程的定义和实施已有一些初步成效，但现有的全球制度基础仍不足以在中长期的尺度上支撑一个全球融合且监管完备的金融体系。以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峰会为开端的尝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原题为“The G20 Financial Reform Agenda After Five Years”。本文作者 NICOLAS VÉRON 为 Bruegel 高级研究员、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4 年 9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危机潜伏之处

Olivier Blanchard /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一个小幅冲击也可能产生较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导致长期和持久的衰退，这被称为“黑暗角落”。但是之前，主流经济学界并未对此予以足够重视。此番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我们离“黑暗角落”比想象的要近得多。编译如下：

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主流观点一致认为，产出和就业波动对经济有积极作用。但此番金融危机无情地驳斥了这一看法，也警示人们是时候进行反思了。

以往观点主要源于内外两方面因素：从内部原因来看，早期经济学的技术主要适用于分析经常性、规律性较强的波动，其局限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相信世界就是在这么一个简单而有规律的体系下运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学理论正是所谓的“理性预期”——即个人、企业行为并不由当前条件决定，而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预期的形成又只能部分地依赖于当前的现有信息。

如何评价这一预测机制呢？应该说这对于“线性”波动较有效。在此，“线性”是指小冲击只会造成有限的影响，严重的后果一定来自于巨大冲击。此外，“线性”还意味着冲击带来后果的严重程度与其本身大小线性正相关，这就排除了即使很小的冲击也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的可能性。这一理念的产生与八十年代早期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背景密切相关：当时产出、消费、投资等各项指标都反映出高度的稳定性，因此线性假设在当时仍是较为符合实际的。但时至今日，即使房价出现很小幅的下降也可能引发对整体经济的“蝴蝶效应”，这也正是我们日后所看到的。

现实中，宏观经济非线性的反应可能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银行挤兑。恐慌有时候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冲击，甚至是空穴来风的传闻造成的。但一旦发生，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将十分严重。不幸的是，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坚信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和央行“最后贷款人”的存在都能够有效防止挤兑现象的出现，也因此一直未严肃对待这一风险。

第二，资本外逃。主要是指由于丧失信心，投资者在极短时间内，集中且大规模地将资金抽离、转移。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如80年代的拉美，90年代的墨西哥以及亚洲主要新兴国家。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却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

第三，流动性问题。主要产生于长期资本与短期债务间期限的不匹配。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影响对象包括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公司企业等。但对此现象的学术研究一直局限于公司金融领域，在宏观主流学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造成非线性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所谓的“零利率下限”，其含义是央行无法将名义利率下调至零以下；其次就是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这使得金融机构必须在资本金减少时做出更为剧烈的反应。尽管认识到存在这些非线性的可能，但普遍的观点仍认为这些因素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十分有限。例如金融危机前，自信的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提高通胀水平就能够将实际利率压低至零以下，从而摆脱“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大缓和”时期的记忆，它不仅迷惑了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金融机构、公司企业，也骗过了金融监管者。直至此番金融危机爆发，可以说是给主流经济学界一记重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离那些“黑暗角落”远比想象的近，同时那些暗角也远比预想的更黑暗得多。

危机发生后，尽管各国对本国货币政策做出了积极调整，例如以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来抵消私人需求的下滑。但接踵而至的却是主权债务危机的频发，以及对政府违约的担忧，而之前所预期的通过提高通胀预期以实现零以下实际利率的目标也并未实现。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银行间的状况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使大规模持有国债的银行资产状况恶化，银行因此需要更多资本金以达到最低资本金要求，而这些资金来源又以公共基金为主，结果是使政府债务情况进一步恶化。

事已至此，目前首要任务应该是逐步将债务水平降低至可控水平以下，尽可能远离暗角。除此之外，以下几点也是未来长期内需要做的：

首先，提高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稳健性。虽然无法确信金融体系透明度的提高就能有效避免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至少造成的危害会小很多——后果可能是一场美国国内经济的温和衰退，决不至于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其次，宏观政策亟待调整。假设之前的名义利率能够更高，那么今天留给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也会充裕许多。设想当初如果名义利率和通胀水平都能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危机爆发后留给央行降息的空间就会增加。这两个点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足以达到当前长期超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同时央行也无需通过大量购买政府长期债券和私人资产来降低长期利率。

最后，对学术研究的反思。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无视非线性影响的可能性了，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为此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学术界中已经出现了金融与宏观两个领域间越来越明显的融合，理论、实证上都涌现了大量研究非线性的文章。

但这又引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宏观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模型是否需要彻底推倒重来？

一个较为务实的回答可能是 DSGE 模型仍可较好地描述常规状态下经济体的运行状况。至于测算系统性风险，以及完成相应预警机制，不妨将其交由另一套风险预测模型。目前来看，将描述常规运行和危机爆发两种状态下经济体的任务交由单一模型来完成，似乎十分困难。

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至今仍未消散，但积极一面是促使宏观经济学家及相关政策制定者严肃反思以往理念。我们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归结起来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离暗角最远的地方。

本文原题为“Where Danger Lurks”。本文作者是世界银行经济顾问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本文于 2014 年 9 月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外包和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

Giuseppe Berlingieri /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现代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变有多少是基于组织边界的转移，即过去在制造企业完成的工作现在有多少外包给专业服务企业？本文考察美国经济过去 60 年的结构变化，发现其投入产出结构的转变主要源自专业技术和商业服务的外包，这解释了服务业增长的 36% 以及制造业下降的 25%。编译如下：

我们一直被告知生活在一个服务经济之中。过去的几十年里，服务业在大多数国家经历了急剧的增长。例如，美国当前服务业就业占就业总人数的 83%，比 1947 年的 60% 有相当大的增长。而另一方面，人们普遍都在哀叹制造业的衰落。Pierce 和 Schott (2014) 认为制造业下降的罪魁祸首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

但如果美国经济“结构性转变”的双方（服务业的上升和制造业的下降）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由国内服务投入的外包来解释——例如，制造业企业年度纳税申报工作外包给专业的会计事务所，结果会怎么样？本文基于生产过程和企业跨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劳动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特别地，本文专注于两个未被观察到的机制，这有助于解释服务业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第一个是中间投入构成的变化——生产最终产品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务（例如，汽车制造企业产生轮胎需求，而大多数公司都需要会计和清洁服务）；第二个是国内中间投入采购方式的变化，本文使用 Helpman (2006) 关于外包的标准定义，即“从一个独立的供应商购买中间商品或服务”。

1、是什么推动美国服务业的增长？

大多数经济结构转型的解释仅关注最终需求，最普遍的一个看法是，当社会变得更加富有，我们将消费更多的服务(Herrendorf et al. 2013)。但是，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了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最终需求的增加并不是服务业增长的唯一驱动力。

首先，三大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专业及商业服务业，他们的扩张解释了服务业部门增长的大部分。其中，专业及商业服务业包括会计、工程、咨询、法律服务以及低技能工作，如安全、维护和清洁服务。

其次，服务业部门都是高度专业化于生产企业的中间投入品，而不是给个人消费者提供其产品和服务。

特别地，专业和商业服务的就业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提高了 9.2 个百分点，大约解释了整个服务部门总增长的 40%——在所有行业中贡献是最大的。此外，该行业产出的 91% 出售给企业作为中间投入或投资，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分别只占其产出的 7% 和 2%。

2、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

专业技术和商业服务业专注于中间品的生产。其强劲增长，反映在经济投入产出结构的相应变化。这可以使用“完全需求系数”表来阐述，该表显示了生产一美元最终产品需所有行业的投入量，表中纳入的交易包括间接投入以及直接投入。

在 1947 年和 2002 年其间，美国经济主要的变化在于其他商品业生产中使用专业技术和商业服务(行业 73)的显著增加，并在较小程度上增加使用金融服务（行业 70）。图 1 显示了对于经济中的所有商品，完全需求系数中由专业和和商业服务需求增加所贡献的比例情况。把所有商品的这种比例数据汇总形成了“前向关联”系数——衡量一个部门通过供应中间投入与其他部门的联系。专业和和商业服务业的“前向关联”系数出现大幅上升，这意味着该行业对经济中其他行业的影响大大增加了(Acemoglu et al . 20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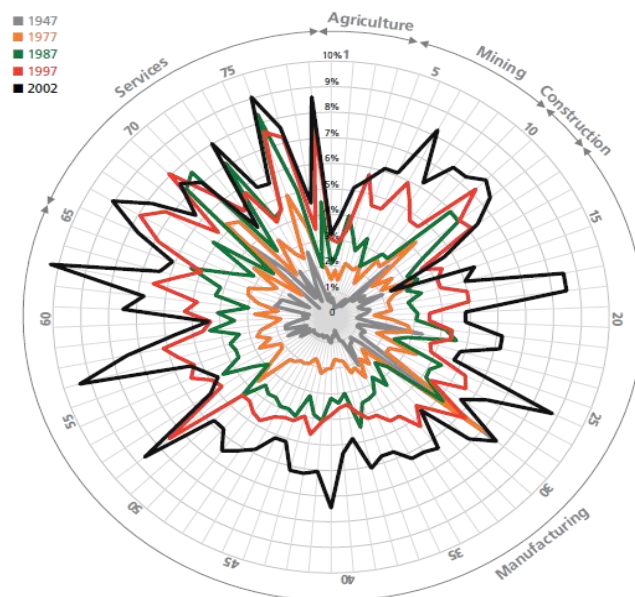


图 1 专业和和商业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1947-2002

图 2 显示了某些选定行业的平均前向关联系数的演变情况。从前向关联来看，专业和和商业服务业已经超越了以运输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成为对其他行业影响力最大的行业，甚至使得增长飞快的金融业也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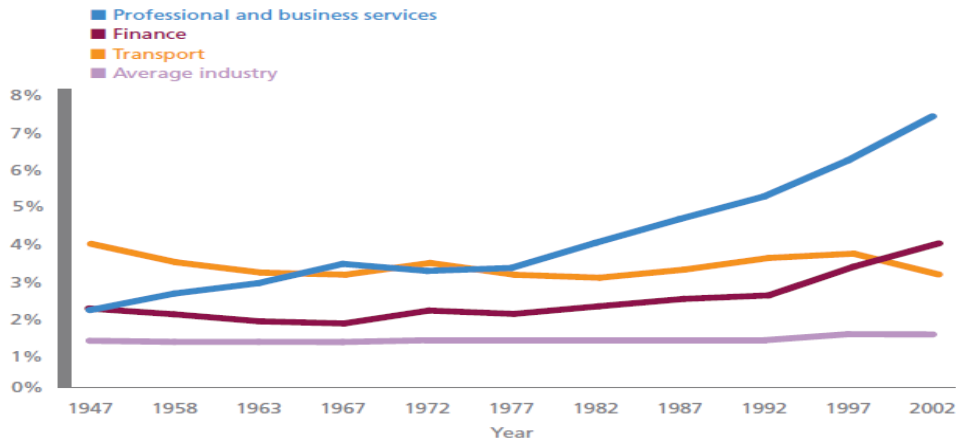


图2 选定行业前向关联系数随时间变化情况

3、结构变化:中间投入和外包的作用

本文基于增长核算模型，观察美国经济投入产出结构的演变，专注于中间投入需求的变化。由此，部门劳动力份额，不再如标准的增值模型那样，仅取决于消费的贡献，而且还取决于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例如，会计部门的就业取决于家庭对会计服务的需求以及企业的需求。

由此，中间投入需求的变化引发劳动力跨部门的重新分配。假定最终需求随时间保持不变，仅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就可以解释服务业就业增加的 36% 以及制造业就业下降的 25%。

随着时间推移，什么是中间投入使用变化的驱动力？一个关键力量是外包。直觉很简单，如果一个制造企业外包其总部服务的一部分，中间服务投入将会增加，因为很可能它将从专业公司购买这些服务。

鉴于专业和商业服务的高度中间生产和高可置换性，以往的研究通常把外包的增加作为这个行业崛起的标志。我采取了相似的方法，但通过界定公司组织边界内的生产进行了改进。

原则上，投入产出数据并不能清楚地区分公司的边界。但是，对于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来说是例外，因为其内部生产大多数以辅助单元进行分类(如总部包括行政、会计、法律服务等)。然后，设定专业和商业服务至 1947 年的水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常数，由此量化多少中间投入的变化归因于专业和商业服务的外包。

我发现，假如公司专业和商业服务完全在内部进行生产，服务业的就业份额比例将比原来小 3 个百分点，相当于其总份额增加的 14%。另一方面，制造业将上调 2.9 个百分点，占其下降的 16%。近年来的贡献甚至更高——商业服务外包占服务业和制造业总变化的 21%。另一方面，占 0.03 个百分点的进口商业服务

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结论和基于纯本土外包数据基本上一致。

4、制造业在服务化吗？来自职业数据的证据

一个潜在的担忧可能来自于总体服务活动增加了公司内部和外部对服务的需求。然而，深入的分析行业数据显示，大部分服务交易发生在企业边界之外，并没有观察到与之相匹配的内部服务产生活动的增加。表 1 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辅助单位对总就业人数的贡献基本不变，这无法解释专业和商业服务对就业贡献的增加。

	1948	1957	1967	1977	1987	1997	2007
PBS	3.34	3.88	4.82	6.13	9.18	12.01	12.56
Auxiliary Units	1.13	1.12	1.09	1.10	1.15	1.27	1.29
PBS – Aux.	2.21	2.76	3.73	5.03	8.03	10.74	11.26

表 1 专业和商业服务业（PBS）对总就业的贡献比例

此外，根据职业和行业分类的数据分析显示，专业和商业服务的总体构成随时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个结果支持了企业跨边界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组织变革的观点。

观察专业和商业服务行业职业类别(PBS 职业)及其随时间对总就业的贡献情况。图 3 显示了他们的贡献份额几乎保持不变。根据基线定义(定义 1)，PBS 职业类别工人占总就业的比例从 1950 年的 24.2% 上升至 2010 年的 28.2%；但是，它从 1970 年开始基本上保持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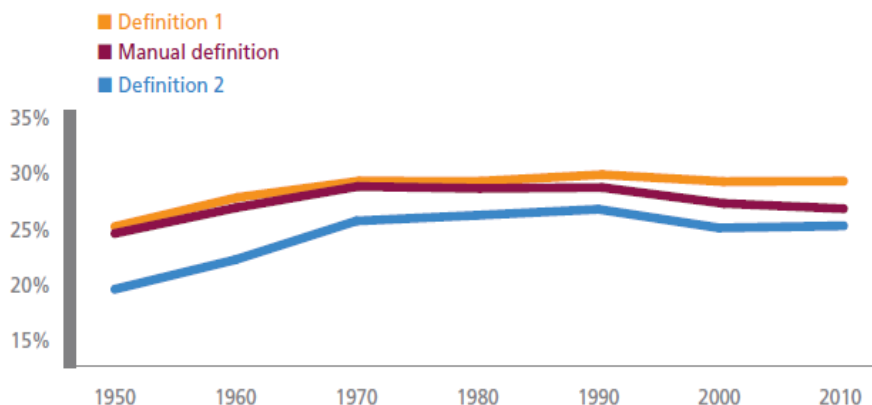


图 3 PBS 职业占总就业的比例

在 1950-2010 的后半时期，外包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如表 1 所示。所以，在 PBS 职业类别工人维持常数的时间段内，专业和商业服务的比例将出现更大幅度的增加。给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对总就业贡献增加的比例，我们希望更多的工人转移至专业和商业服务公司，或者至少这些公司随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

这正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制造业中 PBS 职业工人的份额随着时间不断下降，而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雇佣该类别工人持续上升。图 4 显示了六大类别的 PBS 职业。尽管 PBS 职业的总份额随时间已经大致不变，但在这六个主要类别之间差异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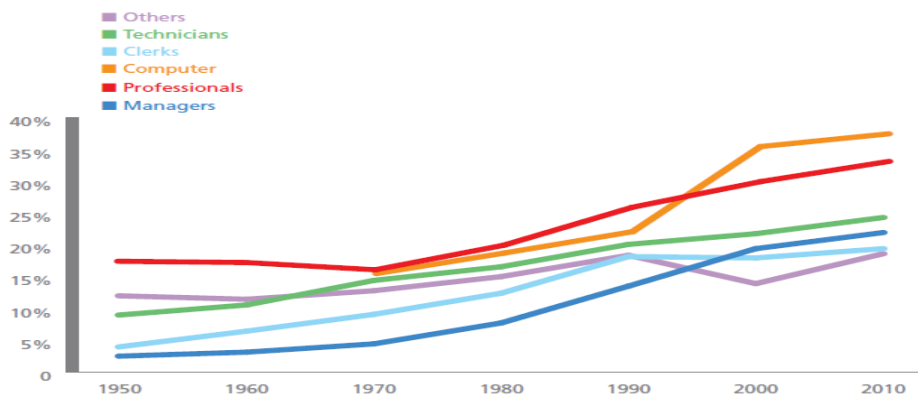


图 4 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中主要类别的 PBS 职业工人比例

5、结论

这些发现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需求方面来看，制造业仍比简单的行业数据显示的那样更为重要。由于中间消耗，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触发许多上游行业更高的产出。

第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服务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这一点似乎在政策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考虑到很多服务具有中间投入的属性，他们对下游行业的生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高效的专业和商业服务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正如 Duarte 和 Restuccia(2014)所强调，感叹制造业下滑的同时，别忽略一个事实：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出口竞争力将越来越依赖服务部门。对于欧洲来说，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服务市场，已经不能再等了。

本文原题为“Outsourcing and the shift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本文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和 OECD 科学部技术创新专员。本文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谈判一周年：TTIP 仍在向前迈进

Simon Lester /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从 2013 年 7 月开始，TTIP 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在第七轮协商即将开始时，有必要全面地评估过去一年来 TTIP 的成果，并提出有效的建议。编译如下：

2013 年，TTIP 协议第一次公开，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联合似乎就在眼前。然而，TTIP 谈判却持续了一年之久。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第七轮协商在华盛顿举行。协议是否真能带来巨大收益？本文将评估已有的成果及其与期望的差距，并提出一些建议。

1、鲁莽地开始

TTIP 带来了许多对贸易协定的希望，因为很多类似的协定都不了了之。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认为 TTIP 将使美国的生产竞争力下降，但考虑到欧洲同样的高工资，这并不是个问题。美国与欧洲具有很多共识，似乎 TTIP 不该遇到很大阻碍。基于双方巨大的经济总量，协议的范围也很广泛：

商品、服务、投资应开放双向市场以提高双方管制的相容性。协议通过开放贸易，使双方都能创造大量工作机会，最终使美欧双方能够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

协议将造成极大的经济影响。有一份研究估计，如果 TTIP 足够激进，可以让美国与欧洲的 GDP 在 2027 年之前分别增长 0.5% 与 0.4%。除了经济收益，TTIP 旨在提高美欧双方对市场监管规则的相容性。

2、事实阻碍了前进

但事实远远更为复杂。美国的生产商对欧洲允许转基因食品的条例大为大肆攻击，但欧洲表明不会动摇立场。欧洲还申明，“文化产品”也不在协议范围之内。农业与飞机业的补贴也是长期饱受争议的重点。谈判开启后，还出现了下列问题：

- 欧洲要求美国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美国以需要严管为由对此拒绝。
- 欧洲要求对文化商品进行特别保护，如法国香槟酒等，但被美国拒绝。
- NSA 的窃听丑闻使得美国在私人数据保护的竞争中落于下风，也在欧洲引发了普遍的反对声。
-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欧洲出了问题，欧洲内部不得不首先展开内部咨询会。

3、管制障碍

除了以上问题，TTIP 中争论最多的是贸易管制问题。有些人表示，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将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分歧能够解决，欧盟的 GDP 会在 2018 年之前增长 0.7%，美国则是 0.3%。然而，人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欧洲希望能够兼容双方各自的监管体系，例如在两个市场统一汽车的测试标

准，而美国希望在规则制定的程序上达成一致。欧洲认为，监管分歧太大会导致效率低下，美国则强力要求欧洲增加监管透明度。双方很难互相妥协。

4、大背景：世界贸易与 TTIP

TTIP 显然还会影响其他经济体。如果欧美达成一致，其他国家会受到什么影响呢？有一种观点认为，TTIP 会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贸易将变得碎片化。如果没有 TTIP，所有人的注意力会放在 WTO 上，这样反而更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TTIP 会为其他经济体的联合铺路，多方协定会因此产生。最终影响恐怕要等 TTIP 的详细内容出来之后才能明确。

5、TTIP 的前景与建议

目前，预测 TTIP 会在 2015 年或更久后才能完全达成。由于美国在 2014 经历中期选举，奥巴马政府的认真态度仍然受到怀疑，TTIP 恐怕要到美国下一任总统任期内才能达成。即便如此，TTIP 仍有希望成功。下面提供一些建议：

投资保护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不应包括在 TTIP 中。支持应该包括的一方，由于其在东欧国家有些与外资待遇相关的问题，认为美欧法庭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而且，如果 TTIP 不能被包括进来，其他国家（例如中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但是，这些观点不够充分。首先，投资保护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究竟是否奏效仍有很大疑问。其次，中国受到的影响仅仅是凭空猜测，没有根据。即便欧美在投资保护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上达成共识，欧盟与美国内部也会出现难以解决的争议，使 TTIP 寸步难行。

文化产品争端难以解决。欧洲对土特产商标具有强烈的保护意向，而美国在这点上不能满足欧洲的要求。双方达成共识的另一种可能，是对这些商品施加贸易壁垒。不论是开放文化商品还是完全不开放，本质上都是一种贸易壁垒。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太多讨论的价值。

监管问题可以分别解决。监管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欧美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虽然 TTIP 可以促使双方让步，但成效可能甚微。与其如此，还不如完全放弃。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快速地做出判断，以求达成共识。

6、结论

过于广泛的 TTIP 不一定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因为现实极其复杂。投资保护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是更为先进的解决机制，但它们究竟是否更好用还不得而知。这些新问题并不包括传统的问题，所以限制议程不会带来很大损失。相反，一些传统问题，例如金融市场是否应该开放，则应得到高度重视。应该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免关税，开放服务与生产市场。

本文原题为“One Year into the TTIP Negotiations: Getting to Yes”。本文作者 Simon Lester 为 Cato 贸易政策分析师。本文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刊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通过基建投融资以促增长

Paola Subacchi, Stephen Pickford, Davide Tentori 和 Helena Huang/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为实现欧洲潜在的长期增长并增加就业岗位，本报告认为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更多、更好的投资。以下是相关政策建议的总结。编译如下：



1、通过发展一种泛欧的基建策略，从而鼓励那些“好”的基建投资、处理各种限制约束和移除瓶颈路段。

- 前瞻性地认清短期与长期的优先事项。各国应当以此来规定优先事项，即能够对经济增长持续产生影响，并具有提高生产率的潜在能力。
- 提升监管系统及更好的金融“工具”——资产规模、信息来源、手段方式，从而鼓励更好的投资并更有效地利用已有的金融资源。
- 鼓励正确选择那些有利的项目。为避免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并在欧盟创建一个全面的渠道，需要在英国国家基建计划（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lan）之上设计一个更好的选择机制。
- 那些由成员国提交至委员会的项目方案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选择，并且遵循一定的标准——例如，跨国范围、规模大小、行业分布等：具有高技术、高回报的行业应当给予优先性。

2、创建一个欧洲基建代理机构，专门负责泛欧基建策略的协调与实施。

这一代理机构应当与 G20、世界银行以及地方性发展银行保持紧密的合作，并与欧盟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EIB）以及欧盟成员国交换信息，建立一个泛欧项目的数据库，同时帮助投资者寻找与之相关的项目并在跨国间进行比较。

3、促进公共与私人部门间的合作。

如果欧洲有抱负重新引领创新、提升竞争力，那么就需要设计公共与私人部门如何良好结合。例如：

- 公共部门应当在项目初始阶段扮演重要角色：设立优先事项、展示透明的采购过程、提供初始的资金支持，给予保障并平滑风险；
- 应当鼓励公私合作（PPPs）。应当建立欧洲公私合作中心，由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盟委员会发起，并在一切涉及公私合作的方面分享经验、专业知识和分析报告。采购过程应当在评估成本和风险上做得更好，从而避免延迟和额外损失。以及，对于投资者的回报给予更大的透明性；
- 对于那些具有高风险、高社会收益的大项目，公共部门应当提供全程的支持并做出保障。一旦某个项目陷入困境，公共部门应当介入，并取得资金的控制权。

4、促使建立一个良好运转的市场，并实施那些能够匹配资本供给与需求的政策。这就包括：

- 重新审查对投资者的评级标准。当下的方案更偏向于那些在短期较为成熟的投资方案。例如，投机性的短期借贷（评级为BB+或更低），比之四年期的BBB+项目抑或八年期的A+项目，保证者只需要提供更少的资本；
- 促进长期投资基金的形成。欧盟委员会2014年3月的公路交通图显示了为长期项目融资的新途径，从而满足欧洲经济的需求；
- 促进国家政府的协调措施。最近当选欧洲议会的政治团体应当将此排上日程，协调议会各成员的国家资本。

5、改善结构和凝聚力基金的分配，从而解决效率损失、提升已有资源的杠杆率并创造激励去选择好的项目。这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

- 欧盟的基金仅提供给与欧洲渠道相关的项目，从而改善资源分配；
- 确保支持和建议落实到位，并保障应得的回报，以减少低效率情形；
- 通过提升欧洲的可用资源来减少合资比例。欧盟委员会可以利用结构和凝聚力基金（Structural and Cohesion Funds）覆盖总成本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则来自于欧洲投资银行（EIB）和各国发展银行的大量债务资金。这些机构能够通过保障基建项目投资以欧元结算，从而集中更多可利用的资源；
- 减少对于地方性基建项目在方向和管理上政府干预，而由欧洲投资银行（EIB）测算投资与回报，从而向投资者保证国家监管系统的强度和稳定性。

6、提高对项目债券的利用，从而填补那些在风险阶段的项目的资金空缺。

在欧洲发展银行(EIB)提出的，且刚刚开展的 2020 年欧盟项目债券方案(EU 2020 Project Bond Initiative)中，可利用的资源应当提高。这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得到加强：

- 扩大合适项目的渠道，并致力于填补处于风险阶段项目的基金空缺。而资源的集中则可由各国的开发银行实现；
- 发行欧洲债券予长期成熟的基建项目。由于发行由所有欧盟国家支持的债券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可以考虑由各国发展银行联合欧洲投资银行(EIB)来发行债券。这种混合债券将是跨国性的，并由几个参与国政府联合保障，使其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

7、捆绑一些不能达到规模下限的小项目，用这种集中的手段为其筹资。

欧盟的联合项目正是建立在英联邦的经验上——优先建设校园项目(Priority School Building Programme)目前利用 7 亿欧元资助了 215 所学校的翻新工作。

8、促进在那些有更多财政余地的国家进行对基础设施的高投资。

例如，德国需要对其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升级，同时它也有财政能力来承担更宏伟的投资项目。

本文原题为“Building Growth in Europe: Innovative Financing for Infrastructure”。本文作者 Paola Subacchi, Stephen Pickford, Davide Tentori 和 Helena Huang 分别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室主任、高级研究员、前任专家、科研助理。本文于 2014 年 9 月刊于 ChathamHous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支付系统角度

Thomas A. Bernes, Paul Jenkins, Perry Mehrling and Daniel H. Neilso/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文章认为全球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支付系统。中国要想参与全球货币体系，需要推动国内经济、政治改革，同时也要积极地与全球货币体系建立对话。编译如下：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生动地证实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统一性和紧密的内在联系。当考虑中国如何能够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全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参与会给全球的统一带来什么潜在影响？

全球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支付系统。它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国际货币的等级制——美元的霸权地位，中央银行的互换协议以及国际货币的发行。此外，它还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义务时，强调流动性的公共来源和私人来源；第二，在评估金融市场风险时，强调流动性的总体规模和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

尽管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并处于货币体系的顶端，但它的发行却是由美联储根据国内经济状况来决定。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通过与别的央行建立互换协议来满足国内流动性的需要。目前，央行的互换协议主要集中在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和加拿大银行 6 家银行之间。

对于中国，金融危机后最重要的政策决议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国内的货币市场以及银行体系还不够成熟，中国选择首先在香港建立离岸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行受迫于中国人民银行大量且日益增加的美元储备。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健的私人市场来吸纳过多的美元储备。显然，离岸市场还远远不够。人民币国际化还将牵涉到在国际私人货币市场和国际央行互换协议之间头寸的转移。

中国目前的挑战是找到参与管理新兴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法。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发展离岸市场来建设一个有深度的、流动性强的货币市场是正确的。但这也需要在岸市场的发展，需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建立紧密的联系以及远期市场的发展。远期利率有助于熨平市场波动。如果没有远期市场，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是市场波动的唯一减震器。

除了汇率的风险，国内的一些经济风险也会影响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自 2008 年之后，中国的债务/GDP 比例一直在上升，而且债务主要集中在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公司。目前中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转型：总需求的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国内需求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倾向于高生产率、私营的服务业部门。

当然，改革的推动需要一定的政治意愿和领导力。所有的改革，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需要明确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可执行工具。在中国，政治决策过程透明度较低，这不利于观察家们来衡量改革的进展。在国家层面上，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综合的策略。原则上，责任以及透明度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制度，在每一个领域执行有效的法律制度。而且，我们认为只要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一党专政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际层面上，管理改革的难度更大。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和别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当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内缺乏合法性。G20 作为为全球经济提供政治领导力的改革尝试，最终事与愿违。中国要想参与全球货币体系，在做好国内改革的同时，还要积极的与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对话。而且，这必定是一个双向对话。

本文原题为“China's Engagement with an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 Payments Perspective”。本文作者 Bernes, 和 Jenkins 为 CIGI 高级研究员，Mehrling 和 Neilso 是 New Economic Thinking 的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9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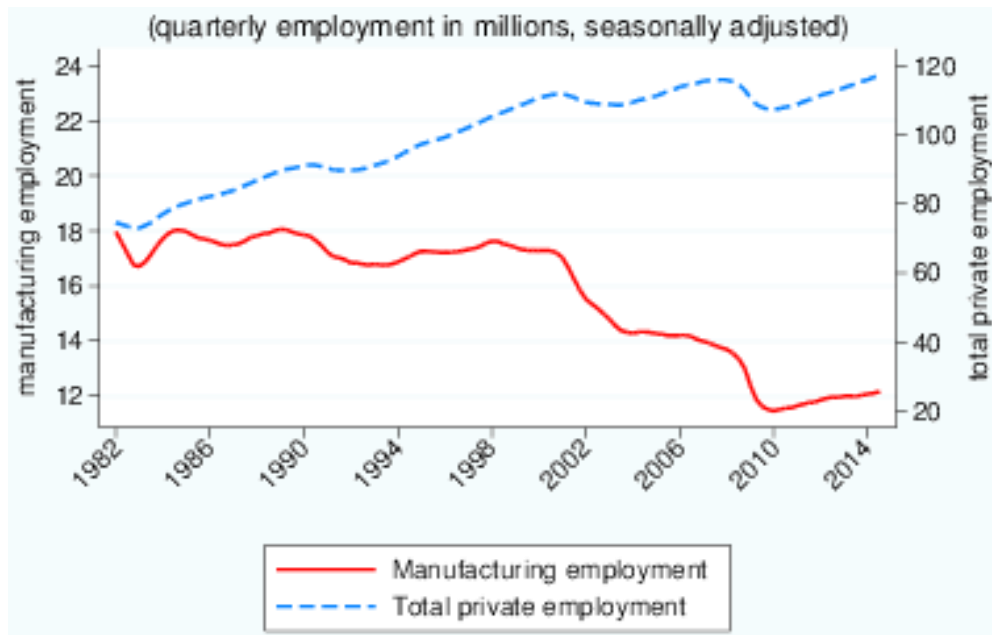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制造业的未来

Daron Acemoglu, David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Brendan Price /文 李想/编译

导读：大衰退之后美国的制造业有所反弹，但就业水平并未从衰退前十年的陡降中恢复过来。本文讨论了中国崛起对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影响程度，既估算了从中国进口带来的直接竞争作用，也估计了本土劳动力市场和买方-卖方的间接影响。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不大可能好转。编译如下：

大衰退的结束重燃了对美国制造业未来的乐观态度。2010年第二季度，美国制造业雇佣工人数量呈现了正增长，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并且在接下去的10个季度里就业均有增加，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工业转型的潜力，他们对于之前美国制造业的困境给出了正面的解读：虽然21世纪前十年的就业有所下降，但工业增加值保持了与整体经济持平的增速。工业部门占美国GDP比重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这是同一时期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罕见的成就。商业媒体使用“回岸”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美国公司将此前离岸给一些低工资地区的就业岗位回归到本土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并未被证实。

在宣布美国制造业复兴之前，有必要再次评估该部门此前衰退的规模，并思考导致就业减少的因素。就业水平缩减的规模着实令人震惊。从图1可以看到，2000年时，美国有1730万工人受雇于制造业，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期性涨落中的正常水平。到2010年，就业数量下降到1150万人，相比2000年下降了33%。出人意料的是，大部分下跌发生于大衰退正式开始之前。2007年年中，雷曼兄弟崩盘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瘫痪的前夕，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就已经降为1390万人，即从2000年到2010年间全部岗位损失的五分之三都发生在美国经济总体收缩之前。图1还展现出近期工业复苏杯水车薪的影响。就2014年年中情况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只有1210万人，比起衰退之前的水平还相差甚远。



数据来源：美国劳动局

图 1 美国就业情况（1980 年第 1 季度到 2014 年第 3 季度）

我们考察了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原因，我们的出发点是 21 世纪前十年里美国制造业的黯淡正好对应着来自中国进口竞争的显著加剧。从 1990 年到 2011 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出口的比重从 2% 增至 16%。这是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采取深入的经济改革措施的结果，并由 2001 年该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与在全球范围的表现一致，中国占美国制造业进口的比重也从 1991 年的 5% 上涨到了 2001 年的 11%，在 2011 年更是跃至 23%。中国的崛起是否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呢？

首先，我们估计了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直接冲击。设想一下，中国的经济开放使得该国能够实现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在毛时代中央计划的体制下因为重重贸易障碍而无法施展。改革使得中国劳动力和资本从农场转向工厂，从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转向更有效率的私人商业，比较优势最强的部门产出将得到扩张。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可耕地和自然资源相对稀缺，因此制造业成为了改革所倡导的工业重组的主要受益部门。中国向制造业的转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又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大大强化。中国占据了自 1990 年以来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经济体工业增加值所有增长的四分之三。

对于许多美国制造企业而言，来自中国进口竞争的加强意味着对他们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他们雇佣工人的数量也会随之缩减。通过考察美国制造业内与中国进口商品有竞争的部门，我们估计，如果没有 1999 年之后来自中国的进

口渗透，到 2011 年时制造业岗位的损失将减少 56 万。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从 1999 年到 2011 年减少了 580 万，我们所估计的中国进口渗透对就业损失的直接影响占据了实际制造业就业缩减的 10%。

这些直接影响并没有捕捉到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对美国就业水平的全部冲击。对某一行业的负面冲击将通过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传导到其他行业。联系的纽带之一就是“买方-供给方”关系。在服装和家具部门日益加剧的进口竞争（这两个部门正是中国的优势），将使得下游行业减少向提供织物、木材、纺织品和伐木器械等的上游部门的采购量。由于买方和供给方的位置通常彼此毗邻，下游行业贸易开放度上升所带来的冲击很可能传导至同一地区或市场的供货商。我们使用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制造业与非制造业行业的下游贸易冲击。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复苏对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将直接影响与利用投入-产出所估计出来的影响加在一起，我们对于 1999 年到 2011 年由于贸易所导致的制造业就业损失的估计上升到了 98.5 万人次，而整体经济的就业损失则是 200 万人次。行业间的联系强化了贸易冲击的就业效应，将制造业内的冲击规模扩大了近乎一倍，对制造业之外的就业也产生了规模相当的作用。

其他两种联系不同部门的因素是总需求的变动和劳动力的再分配。当制造业萎缩时，失业工人或收入降低的工人将缩减他们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通过标准凯恩斯的传导机制，即抑制总消费和总投资，需求缩减对于整体经济的作用是翻倍的。从制造业脱离的工人可能在服务业或经济的其他部门就业，弥补了部分在贸易开放行业的收入损失，从而抵消了一些负面总需求效应。因为总需求效应和就业重新配置效应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们只能识别它们对总体就业的净效果。更深一步的问题在于，这些效应在总体经济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而不像贸易冲击的直接影响和投入-产出效应那样在行业层面上起作用，这意味着我们所能拥有的数据点与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开始的年份相同。因为中国的出口浪潮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才全力涌现，美国国家层面可得的时间序列就非常短。

为了应对这一数据问题，我们使用地区经济的数据来完善对于美国产业的分析。我们将包含着清晰的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有商业联系的郡县加总，定义为“通勤区域”。因为通勤区域内各自的行业分工模式迥异，它们所面对的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增长的情况也不相同。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希维尔是一个家具制造中心，是中国进口竞争的直接受影响地区。与之对照，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和哈利波特主题公园所在地），聚焦于旅游业，受制造业产品进口增长的影响较轻。如果再分配机制起作用的话，中国竞争的结果使得某地本土产

业萎缩，那么在同一个通勤区域的其他产业就应该扩张。总需求效应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作用，如果某地因为贸易开放而减少了总就业，缩减的收入将降低对非贸易的本地商品与服务的支出，在整个本地经济中扩大冲击。

我们对于总需求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净冲击的估计表明，1999年到2011年来自中国进口的增长导致了就业下降240万。这一数字比之前我们仅捕捉直接和投入-产出效应对全国产业估计得到的200万稍大一些，但仍可能低估了中国冲击美国就业的全部后果。不论是关于通勤区域的分析，还是关于全国产业的分析，各自都没有完全包括另一种分析的调整渠道。基于全国产业的估计排除了再分配和总需求效应，而通勤区域的分析则排除了这两种效应的全国性因素，以及投入-产出联系效应的非本地因素。因为通勤区域的估计表明总体的力量扩大而非抵消了进口竞争的影响，我们将基于产业水平的估计视作就业损失的保守下限。

我们的发现对于美国制造业复苏的潜力有何启示呢？近年来美国制造业进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品中拥有强大比较优势。美国在服装、家具、鞋类和其他工资敏感性产品上损失给中国的岗位不大可能回来。即使中国的劳动成本上升，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更有可能转向孟加拉、越南或其他崛起的国家，而不是重新出现于美国本土。而且，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远没有结束。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迅猛地进军手提电脑和手机的组装行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出现，比如联想和华为。虽然前景看起来相当惨淡，但美国的制造业仍有希望。或许最振奋人心的迹象就是许多面对贸易冲击的企业开始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技术的进步最终可能为美国的生产商创造新的市场。然而，如果制造业常规岗位自动化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可能更多地推动增加值的增长，而非增加进入工厂就业的工人数量。

本文原题为“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US manufacturing”。本文作者 Daron Acemoglu 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David Autor 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David Dorn 为瑞士苏黎世大学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主席，Gordon H. Hanson 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经济关系主席、新兴与太平洋经济中心主任，Brendan Price 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于2014年9月28日刊于VOX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ISIS 如何为其恐怖统治筹集资金

Howard Shatz/文 刘宁/编译

导读：一个自称是建立了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在短短的时间内到处攻城略地，那么这个组织是如何筹集其活动资金的，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些组织是受到了外国国家的援助，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所谓的外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资金来源于 ISIS 本身。打击 ISIS 将面临很大的挑战。编译如下：

一个叫做 ISIS 的恐怖活动组织自称他们现在建立了伊斯兰国，这个组织目前拥有一支由本国人和外国人组成的混合军队，这个组织不但建立了炼油厂、从事交通运输，甚至还建立了税收体系。

尽管有谣言宣传 ISIS 组织获得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海湾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科威特，但是很少有证据能证明这些观点准确性。这个组织即便是在（2007y-2009y）美国的打击下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但这期间它仍然在使用自己的本土资金。

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钱流向 ISIS，但是停止国际间的交易并不能阻止 ISIS 继续筹集资金。不论国际上对 ISIS 有何种影响，ISIS 现在已经增加了他们在本土筹集资金的能力，这将增加了打击这个组织的难度。

作为在兰德公司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从 2006 年后，我们通过分析文档、手册、ISIS 组织的领导人以及该组织的前期组织，我们认真研究了 ISIS 的财务状况、领导组织、还有管理问题。最近在普林斯顿大学、埃尔默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帮助下，我们分析了 150 多个文件（基于 2005y-2010y 间的数据），大致可以作出以下一些结论。

需要强调的是 ISIS 筹集资金的能力就好像和黑社会组织一样，他们从事走私物品、绑架、勒索等活动。尽管他们宣扬自己是受到了宗教的启示，但是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更有组织的邪教犯罪。

通过控制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的油田对外走私石油是 ISIS 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据报道 ISIS 现在控制了十几个油田还有一些炼油厂，初步估计，ISIS 每天大概能有 100-200 万美元的收入。

为了保证石油能够直接流向买家并通过中间商流向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国的市场，甚至包括伊朗，ISIS 保留了一些技术工人，但是他们将上层的管理人员换成了自己人。

ISIS 的前身是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开始主要通过偷盗的方式在本地筹集资金，这个组织在伊拉克的安巴尔省达到权力的顶峰（2005y-2006y），在 11 个

月内，基地组织在这个省份受到的捐助只有总收入的不到 5%，但是这个组织的“石油部”却通过炼油走私获得 2 亿美元的收入。

ISIS 确实是一个富有效率资金筹集者，但同时这个组织也是花钱如流水一般。ISIS 组织除了按家庭人口向组织成员派发工资外，还要担负由组织成员被抓或被杀后的开支。当然伤亡是很高的，这意味着 ISIS 有很高的用人成本，但是这个组织也有很活跃的人力资本。

ISIS 同样要为一部分成员支付租金还有提供医疗服务、维护住所安全、购买武器还有其他设备。作为一个现金管理组织，还要控制内部贪污腐败。

从历史上看，ISIS 获得的可怜的外部捐助主要来自旅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支持者，很多情况下都是自杀式的导弹袭击者。当然来自海湾国家的捐助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今天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的来自海湾富有国家的捐款起不到很大作用。

打击 ISIS 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策略，其中包括发动战争、除掉或者逮捕 ISIS 组织高级成员、打击石油走私并且采用金融限制等手段，还有就是对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进行不良信息的清理，尤其是针对 ISIS 组织的那些成员。

就从长远来看，摧毁 ISIS 组织需要伊拉克以及利比亚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对于在这一地区的国家来说，打击行动将更具有合法性。

尽管海外国家的财力在 ISIS 崛起中起到的作用很小，但是我们推测在培育 ISIS 思想体系方面，这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这场战斗需要长期的努力，但是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努力必须要来自海湾国家。

本文原题为“[How ISIS Funds Its Reign of Terror?](#)”。本文作者霍华德·沙茨 (Howard Shatz) 为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摧毁“伊斯兰国”：奥巴马的战略会成功吗？

Ahmed S. Hashim/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2014年9月10日美国奥巴马总统推出了打击IS（“伊斯兰国”）的策略。但这六点计划更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预言。也许只会带来持续不断的灾难，这一战略是否可以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编译如下：

1、评论

2014年9月10日奥巴马总统推出了应对IS（“伊斯兰国”）的策略。首先，它呼吁加强在伊拉克的空中轰炸。自8月中旬以来，空中力量已成功的遏制住了IS迅猛的进攻势头。它甚至允许士气低落的伊拉克军队和被大大高估了的库尔德武装收回一些以前被伊斯兰国征服的领土。然而，在像提克里特这样的地方，伊拉克特种部队的推进速度却很慢。

2、空中力量的问题

过度依赖空中力量来铲除武装分子是有问题的。IS已经吸取了前几次空中打击的教训。他们已经开始分散，挖掘隧道，伪装和融入到城市。这样空中力量的效应就可能降低，也就不可能彻底的铲除IS的控制系统。如果IS转入地下，他们将从运动式的闪电战重新回到自己所驾轻就熟的纯恐怖主义战术中。

其次，该战略要求训练和装备伊拉克军队的和库尔德武装。由外部力量训练和装备东道主国家武装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美国在伊拉克投入更多的钱结果却可能只是可耻的失败，仅在2014年6月和7月美国就已经花费了240亿美元。6月，总数仅为800人的两个伊斯兰国武装营，竟然从伊拉克两个师高达30000人的手中夺取了摩苏尔。

伊拉克军队是国家政体失败的牺牲品：持续不断的教派冲突，深入固化的宗派亲属关系而非专业性，腐败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规模，落后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因为政客们对军官的不信任。美国可以向伊拉克人提供世界上最好的装备，但是如果伊拉克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很难有所作为。

库尔德武装虽然比伊拉克军队纪律更严明，但组织却好不到哪儿去。他们都过度沉浸于过去作为游击队战士对抗伊拉克政权的历史荣光当中。所谓“自由斗士”，其实只是死亡的威胁唤起了他们的勇气和作战能力。6月他们也被伊斯兰武装打得一败涂地。他们当前遇到的问题是还不能作为一个富有创新的、训练有素的部队应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而适应从游击战向运动的准常规型“混合”战役转变。

这一准军事部队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而是由两个在这一地区库尔德政党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分别控制。库尔德武装可能比美国援助和训练的伊拉克

军队更迅速和高效。但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美国不可能使库尔德武装的战斗力超过巴格达中央政府。

3、轰炸叙利亚：使问题复杂化

第三，该战略呼吁轰炸叙利亚。与轰炸伊拉克相关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叙利亚。这些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因为 IS 在叙利亚东部有很深的根基。此外，轰炸叙利亚的提议真正关心的是弱化 IS 还是削弱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呢？这值得怀疑，许多美国人希望巴沙尔政权受到削弱，但是这将偏离我们关注圣战者的目标。

第四，这一战略要求培训和武装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其中哪些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美国迷恋使用“温和派”这样自他几十年前进入该地区以来就一直使用的陈词滥调。但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并不温和，3 年野蛮的内战已经证明，他们大多数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无法处理 IS 问题。

第五，该战略要求联合欧盟和地区盟友共同打击 IS。但是，这需要从一开始就制定明确的分工。美国必须实行明确的领导，并要求每个国家都要有所贡献，要明确最重要的盟友：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将会与美国合作共同打击 IS。

第六，美国说它不会派出地面部队，也不会寻求与叙利亚和伊朗政权的任何妥协。

4、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战略

西方的空中力量和依靠当地地面部队的缺点是很明显的，这将无法对 IS 的系统控制造成任何实质破坏。任何使用无人飞机的行动都必须提前仔细权衡，避免最终在平民中产生更大的敌意。现在需要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派遣小规模的地面部队。

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特种作战部队。他们摧毁了基地组织。其地面部队可以有效的完成斩首 IS 领导人和其他人员的任务。此外，地面部队还可以帮助美国及其盟友使逊尼派部落和前叛乱分子远离 IS。这将要求美国像 2006 年和 2009 年之间打击圣战分子时一样与逊尼派部落进行紧密合作。

单纯通过军事手段不能打败 IS。美国必须在政治和外交上与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中央政府进行合作。库尔德人应该因他们的合作而获得奖励。这不能以伊拉克的领土为代价，这只会加强逊尼派的不满，因为他们将会失去最北部的领土。积极劝诱巴格达政府让渡部分政治权利和以公平为原则的经济援助的工作必须同时进行。

无论是单纯的美国自身的原因还是由于来自盟友的压力，从而无视或绕过叙利亚和伊朗，这都是一种战略上的短视。与伊朗接触并不意味着要安抚它，而是要警告它在我们努力沿着民族不是宗派的路线重建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时候不要搞任何阴谋。

由于叙利亚政府已经不堪重负，并且品行值得怀疑，所以在打击 IS 问题上叙利亚不能提供太多帮助，但支持反对派的政策也同样充满了危险。温和反对派将主要针对阿萨德政权从而忽视 IS 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在这样做。在美国着手处理 IS 的时候，非圣战分子将会很乐意的看着他们的两个对手相互争斗。非圣战分子——许多人隶属于基地组织，他们不应该成为这场争斗的最终赢家，他们同样需要被打击和摧毁。

本文原题为“Defeating IS: Will the Obama strategy succeed? ”。本文作者艾哈迈德·哈希姆（Ahmed S. Hashim）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

简介：AEI成立于1943年，是一家私人的、非党派、非盈利机构，从事政府、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和教育。AEI的目的是通过从事与当前最重要之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为领导人和公众服务。AEI下设七个研究部门：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政治与公共舆论、教育、健康、能源与环境以及社会与文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AEI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7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9名。

网址：www.aei.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 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 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 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 www.chathamhouse.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 兰德公司成立于 1948 年, 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 RAND 逐步扩展, 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